

# 治理环境、产权性质与内部控制治理效应

## ——基于公司违规视角的研究

赵 璨<sup>1</sup> 曹 伟<sup>1</sup> 朱锦余<sup>2</sup>

(1.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00; 2. 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1)

**[摘 要]** 利用我国 A 股上市公司 2007 年至 2010 年的数据, 实证研究发现: 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上市公司发生违规的可能性越小; 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 非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对公司违规的抑制作用更强, 这说明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占据多数的特殊背景下, 内部控制和产权性质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 随着治理环境的改善, 内在控制在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作用差异会弱化。

**[关键词]** 治理环境; 产权性质; 内部控制; 公司违规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3410(2013)06 - 0124 - 08

### 一、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 美国安然事件以及随后的世通公司财务欺诈案极大地挫伤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和管理层的信任, 我国郑百文、银广夏、蓝田股份和德隆系等系列财务舞弊案同样为资本市场带来沉重的打击; 近年来, 绿大地、紫鑫药业等发生的丑闻又一次将上市公司违规话题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一桩桩上市公司违案件屡屡敲击着企业、政府、投资者脆弱的神经, 成为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2002 年美国颁布《萨班斯 - 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 - Oxley Act, SOX), 我国 2008 年 6 月 28 日由财政部、审计署、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五部委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并于 2010 年颁布了配套指引, 国内外完善内部控制, 保护投资者权益, 降低代理成本成为主管部门和监管当局的一项制度安排。针对内部控制实施效果的研究成为国内外专家研究的焦点。那么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即, 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是否能够在抑制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呢?

我国的产权性质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别。在资

本市场上, 产权性质为国有性质的高达 58.78%, 上市公司承担着为国企解困、解决就业、增加税收等多重任务, 国有上市公司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刘启亮等, 2012)。另外, 我国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 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 虽然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各个省市的发展程度是极不平衡的, 主要表现在: 东部沿海地区市场化进程比较快, 而中西部地区比较慢, 尤其是西部地区相对滞后。在这样一个制度背景下,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治理作用的发挥是否受到产权性质及治理环境的影响呢? 研究可以说明, 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完善在抑制公司违规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 内部控制对公司违规的抑制作用更强, 并且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提 高, 内部控制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之间的差异逐步弱化。

本文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第三部分数据与研究设计, 包括样本选择、数据来源、研究设计及描述性统计, 第四部分实证检验与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预警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10XJY006)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璨(1985 - ), 女, 山东济南人,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内部控制与审计理论。

分析,第五部分结论。

##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一)内部控制治理效应

1992年,美国COSO委员会将内部控制定义为“由企业董事会、经理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旨在为实现下列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一个过程:(1)企业经营的效率和效果;(2)财务报告的可靠性;(3)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性。”从内部控制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内部控制在监督上市公司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SOX以及该法案与内控相关的第302条款、第404条款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降低代理成本,保护投资者权益。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08)第三条指出“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我们可以看出,实施内控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确保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限制经理人和大股东披露虚假信息,操纵会计信息的行为,避免出现违规行为,以保护投资者利益。

国外针对SOX实施有效性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内部控制的实施改善会计信息质量(Ashbaugh-Skaife et al., 2008; Doyle et al., 2007);降低融资成本(Hammersley et al., 2008; Beneish et al., 2008; Ashbaugh-Skaife et al. 2007、2009);提高公司价值(Litvak, 2007);保护投资者权益(Kim et al., 2009)、抑制上市公司违规行为(Bologna, 1993; McMullen, 1996)等。

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张川等(2009)从审计师评价和企业的视角,分析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杨德明等(2009)研究了内部控制、审计质量与大股东资金占用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内部控制与独立的外部审计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起到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积极作用;孙芳城等(2011)从反倾销的角度证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高,被裁定的反倾销税率就越低;李万福等(2011)从公司投资的角度得出内部控制可以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杨德明和冯晓(2011)从银行贷款和债务期限的角度得出高质量内部控制有助于获得银行更多的长期贷款和更长

的贷款期限;方红星和金玉娜(2011)从会计信息质量的视角得出高质量内部控制可以抑制公司的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卢锐等(2011)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角度研究得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其管理层薪酬业绩的敏感度也越高。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上市公司违规的可能性越小。

### (二)产权性质与内部控制治理效应

在我国,证券市场建立的目的是促进国企改革,为国企解困。虽然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其治理结构和监管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最终还是由各级政府控制,政府依然有能力将自身目标内化到国有企业中,从而影响国有企业运营以及经济行为。国有企业往往承担着来自政府的多重任务,林毅夫等(2004)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承担着更多的政策性负担,如经济发展战略、促进就业、增加税收、维持稳定等。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

既然政府会由于各种原因会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进行干预,那么在国有上市公司出现违规行为时,考虑到公司声誉、社会影响、个人政绩等方面的因素,同样会对其违规行为进行干预。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或者为了提高行政业绩创造更大的职位升迁可能,甚至为了更多的灰色收入,往往会对本地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采取纵容、包庇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有许多是经过政府改制,脱胎于某部委,其管理层的级别与证监会相当,甚至高于深、沪市交易所,当这些上市公司发生违规行为后,证监会、交易所对其进行处罚时不得不考虑法律之外的利益因素,如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公司的潜在收益、国有上市公司的声誉、处罚主体位级过低等因素。因此,当这些由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出现“打擦边球”或者违规行为时,监管层可能会采取漠然视之的中庸态度。而对于非国有企业,企业自担经营风险,政府并不为其经营风险或者是违规行为买单,因此非国有上市公司更有动力去完善内部控制,控制公司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内部控制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发挥的作用更强。

### (三)治理环境、产权性质与内部控制治理效应

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要求中央企业实施该指引。其中第九条要求中央企业“建立单项或多项内部控制子系统,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要求国有企业“制定风险解决的内控方案”,并规定了企业制定内控措施应涵盖的具体内容。国资委为了满足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非常重视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并指派专门人员负责监督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情况。

既然国有企业在内部控制建设过程中受到国资委的监督控制,其内部控制质量应该至少不弱于非国有企业,那么内部控制在国有企业发挥的作用至少不应该弱于非国有企业。如果假设2成立,其原因是政府干预。政府考虑到政绩、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原因,对国有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进行干预,导致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可能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往往会对国有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法律约束难以对其发挥作用,导致内部控制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的作用减弱。

随着治理环境的改善,市场化程度提高,政府干预减弱,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因此,随着治理环境的改善,“内部控制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作用减弱”的现象就不会存在。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可以弱化内部控制在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作用差异。

## 三、数据与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择

2006年上交所、2007年深交所分别发布内部控制指引之后,我国上市公司开始关注内部控制建设,因此本文的研究样本选择2007-2010年A股上市公司,在此基础上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剔除主要解释变量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了6255个研究样本,其中2007年1420个研究样本,2008年1269个研究样本,2009年1581个研究样本,2010年1985

个研究样本。

###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中关于公司违规变量参考张翼、马光(2005)的研究,即触犯证券法和相关规定的行为,数据来源于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和深交所发布的处罚公告,若存在多年被处罚的样本,则将每一年处罚分别看成是一个样本,例如,如果某上市公司2007、2008均受到处罚,则视为两个样本,若某上市公司2007年被处罚了两次,则视为一个样本。最终共得到186个公司违规样本。其中2007年81家,2008年41家,2009年43家,2010年21家,基本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

本文中对内部控制评价指标和是否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由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内部控制评价指标由内部环境(包括19个指标)、风险评估(包括8个指标)、控制活动(包括12个指标)、信息与沟通(包括6个指标)、监督检查(包括6个指标),以及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出具评价报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是否发表意见等七部分组成,通过查询相对应的年报,只要上市公司建立或从事了与某一指标相关的制度或行为,就赋值1分,最后将分值加总,即可得到该评价指标。

本文中地区治理环境的指标来自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2011)的研究。该研究主要以2007-2009年的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为基础,采用“主因素分析法”,编制出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场化相对进程指标。这一指标涉及五个方面,分别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本文参考夏立军、方秩强(2005)的研究,采用2007年地区相对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治理环境的变量。虽然本文研究年度是2007-2010年间,但是考虑到我国2007-2010年间的市场化程度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故均用2007年地区相对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衡量治理环境的变量,应该不会对结论的可靠性产生影响。

其余数据均来自色诺芬数据库。本文采用winsorization方法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异常值处理,即对所有连续变量的小于1%分位数(大于99%分位数),令其值分别等于1%分位数(99%分位数)。

(三)研究设计

构建了以下两个模型,采用 Probit 回归,检验假设 1、假设 2 和假设 3 是否成立。

$$\text{Fraud} = \alpha + \beta_1 \text{IC} + \beta_2 \text{State} + \beta_3 \text{Size} + \beta_4 \text{NO1} + \beta_5 \text{ROA} + \beta_6 \text{Lever} + \beta_7 \text{Growth} + \beta_8 \sum \text{Industry} + \beta_9 \sum \text{year} + \varepsilon \tag{1}$$

$$\text{Fraud} = \alpha + \beta_1 \text{IC} + \beta_2 \text{IC} \times \text{State} + \beta_3 \text{State} + \beta_4 \text{Size} + \beta_5 \text{NO1} + \beta_6 \text{ROA} + \beta_7 \text{Lever} + \beta_8 \text{Growth} + \beta_9 \sum \text{Industry} + \beta_{10} \sum \text{year} + \varepsilon \tag{2}$$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 Fraud。上市公司如果受到违规处罚,取值为 1,否则为 0。解释变量包括 IC 和 IC × State

其中 IC 表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包括 IC<sub>1</sub> 和 IC<sub>2</sub> 两个指标。IC<sub>1</sub> 是内部控制评价指标;IC<sub>2</sub> 表示是否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如果披露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参考林斌和饶静(2009)、张龙平等(2010)的研究,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内部控制比较健全的公司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所以用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替代变量具有可行性。IC<sub>1</sub> 指标越大,或 IC<sub>2</sub> 取值为 1,都表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State 表示产权性质,取值为 1 表示非国有上市公司,取值为 0 表示国有上市公司。IC × State 表示 IC 与 State 的交叉项。

此外,控制变量的选取参考张翼和马光(2005)、单华军(2010)的相关研究,引入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NO1)、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er)和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变量的详细定义见表 1。

模型(1)用来检验假设 1 是否成立,如果假设 1 成立,IC 的回归系数 β<sub>1</sub> 应显著为负。

模型(2)用来检验假设 2 是否成立,如果假设 2

成立,IC × State 的回归系数 β<sub>2</sub> 应显著为负。

以地区治理环境指标的中位数为界,将总体样本分为治理环境好的组和治理环境差的组,分别对模型(2)进行回归,如果假设 3 成立,那么在治理环境好的组 IC × State 的回归系数 β<sub>2</sub> 应不显著,而在治理环境差的组 IC × State 的回归系数 β<sub>2</sub> 应显著为负。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	变量定义与含义
Fraud	是否受到违规处罚,受到违规处罚取 1,否则取 0
IC <sub>1</sub>	内部控制评价指标
IC <sub>2</sub>	是否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自愿披露取 1,否则取 0
State	产权性质,非国有取值 1,国有取值为 0
IC * State	IC 与 State 的交叉项,即 IC 与 State 的乘积
Size	上市公司规模,用总资产的对数表示
NO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ROA	资产收益率
Lever	资产负债率
Growth	销售收入增长率
Market	地区相对市场化指数

(四)描述性统计

表 2 中,我们按上市公司是否违规以及年度进行了分组,并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 2 中我们可以发现违规公司的内部控制指数(即内部控制质量)均值为 11.857,显著低于非违规公司 19.374;并且非违规样本有 29.4% 的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而违规样本中仅有 6.6% 的公司披露。初步说明了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公司违规的可能性越小。同时,还可以发现,相对于非违规样本,发生违规公司的规模更小,股权集中度更低,盈利能力更差,经营风险更高,成长性更差。

分年度的描述性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内部控制指数(IC<sub>1</sub>)从 2007 年到 2010 年呈现出显著递增的趋势,并且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上市公司有 2007 年的 15% 上升到 2010 年的 41.6%,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上市公司越来越重视内部控制的建设。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样本	统计值	IC <sub>1</sub>	IC <sub>2</sub>	Market	State	Size	NO1	ROA	Lever	Growth
非违规公司 样本	均值	19.374	0.294	9.013	0.433	21.526	0.361	0.080	0.518	0.142
	中位数	18	0	9.450	0	21.396	0.340	0.085	0.495	0.001
	标准差	10.561	0.456	2.046	0.496	1.275	0.156	0.218	0.348	0.694
	样本量	6141	6483	6753	6495	6528	6753	6526	6532	6532
违规公司 样本	均值	11.857	0.066	8.343	0.534	20.565	0.326	-0.049	0.869	-0.019
	中位数	11	0	8.100	1	20.376	0.313	0.039	0.645	0.001
	标准差	7.935	0.249	2.080	0.500	1.239	0.149	0.495	0.713	0.719
	样本量	161	166	181	174	173	181	173	175	175

续表 2

2007 年样本	均值	10.830	0.150	8.916	0.369	21.393	0.357	0.087	0.559	0.042
	中位数	9	0	8.81	0	21.304	0.338	0.078	0.519	0.000
	标准差	6.985	0.357	2.074	0.483	1.220	0.152	0.249	0.372	0.467
	样本量	1427	1514	1541	1473	1447	1541	1477	1479	1479
2008 年样本	均值	16.430	0.182	8.933	0.377	21.459	0.359	0.045	0.548	0.183
	中位数	15	0	8.81	0	21.354	0.343	0.067	0.514	0.100
	标准差	9.151	0.386	2.066	0.485	1.262	0.155	0.263	0.366	0.668
	样本量	1273	1337	1583	1536	1539	1583	1538	1539	1539
2009 年样本	均值	20.468	0.337	8.995	0.426	21.521	0.362	0.071	0.531	-0.014
	中位数	21	0	9.45	0	21.405	0.339	0.081	0.503	-0.006
	标准差	8.897	0.473	2.051	0.495	1.325	0.157	0.242	0.361	0.764
	样本量	1599	1683	1725	1659	1677	1725	1677	1678	1678
2010 年样本	均值	25.854	0.416	9.101	0.538	21.596	0.362	0.097	0.483	0.300
	中位数	25	0	9.45	1	21.432	0.340	0.086	0.458	0.143
	标准差	10.029	0.493	2.013	0.499	1.302	0.159	0.170	0.362	0.755
	样本量	2003	2115	2085	2001	2008	2085	2007	2011	2011
全样本	均值	19.182	0.288	8.995	0.436	21.501	0.360	0.076	0.527	0.138
	中位数	18	0	9.450	0	21.376	0.340	0.084	0.498	0.001
	标准差	10.577	0.453	2.049	0.496	1.283	0.156	0.230	0.366	0.695
	样本量	6302	6649	6934	6669	6701	6934	6699	6707	6707
统计检验	T	8.957 ***	6.418 ***	4.349 ***	-2.663 **	9.789 ***	3.022 ***	7.263 ***	-12.667 ***	3.026 ***
	Z	9.050 ***	6.399 ***	4.479 ***	-2.661 **	9.651 ***	3.031 ***	4.505 ***	-7.584 ***	5.672 ***

注:T 统计值为 Fraud =0 样本 VS Fraud =1 样本相关变量的均值检验,Z 计值为 Fraud =0 样本 VS Fraud =1 样本相关变量的 Wilcoxon 检验;\*\*\*表示 0.01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0.05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0.1 的显著性水平。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 产权性质、内部控制与公司违规

表 3 给出了假设的检验结果,从表 3 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全体样本,第(1)列和第(2)列分别列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IC<sub>1</sub> 和 IC<sub>2</sub> 系数分别为 -0.031和 -0.514,并且都通过了 0.01 的显著性测试。这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公司出现违规的可能性越小,内部控制具有抑制公司违规的作用,假设 1 得到了验证。

进一步,将全体样本分为国有样本和非国有样本,第(3)列和第(4)列给出了国有样本下内部控制

质量与公司违规的关系,IC1 和 IC2 系数分别为 -0.019和 -0.302,并且分别通过了 0.01 和 0.1 的显著性测试;第(5)列和第(6)列分别给出了非国有样本下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司违规的关系,IC<sub>1</sub> 和 IC<sub>2</sub> 系数分别为 -0.047 和 -0.776,并且均通过了 0.01 的显著性测试。我们可以看出内部控制不管是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还是非国有上市公司均具有抑制公司违规的作用。从回归的系数来看,非国有样本 IC<sub>1</sub> 和 IC<sub>2</sub> 的系数的绝对值( -0.047, -0.776)要高于国有样本( -0.019, -0.302),初步说明了内部控制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对公司违规的抑制作用更强。

表 3 假设 1 和假设 2 的检验

变量	模型(1)		模型(1)国有样本		模型(2)非国有样本		模型(2)	
	(1)	(2)	(3)	(4)	(5)	(6)	(7)	(8)
截距	2.862 ***	2.723 ***	1.659 *	1.650 *	4.949 ***	4.375 ***	2.757 ***	2.710 ***
	(0.000)	(0.000)	(0.090)	(0.090)	(0.000)	(0.000)	(0.000)	(0.000)
IC <sub>1</sub>	-0.031 ***		-0.019 ***		-0.047 ***		-0.019 ***	
	(0.000)		(0.002)		(0.000)		(0.002)	
IC <sub>2</sub>		-0.514 ***		-0.302 *		-0.776 ***		-0.313 **
		(0.000)		(0.054)		(0.000)		(0.038)
IC <sub>1</sub> × State								-0.025 ***
								(0.006)
IC <sub>2</sub> × State								-0.426 *
								(0.071)
State	0.047	0.022					0.389 ***	0.067
	(0.565)	(0.785)					(0.009)	(0.399)

续表 3

SIZE <sub>it</sub>	-0.203***	-0.214***	-0.156***	-0.166***	-0.295***	-0.294***	-0.206***	-0.21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NOI <sub>it</sub>	-0.750***	-0.758***	-1.148***	-1.141***	-0.300	-0.351	-0.743***	-0.756***
	(0.003)	(0.002)	(0.001)	(0.001)	(0.414)	(0.323)	(0.003)	(0.002)
ROA <sub>it</sub>	-0.376***	-0.383***	-0.292*	-0.278*	-0.435***	-0.490***	-0.369***	-0.387***
	(0.001)	(0.000)	(0.059)	(0.073)	(0.005)	(0.001)	(0.001)	(0.000)
Lever <sub>it</sub>	0.336***	0.345***	0.584***	0.571***	0.197**	0.228***	0.322**	0.336***
	(0.000)	(0.000)	(0.000)	(0.000)	(0.014)	(0.003)	(0.000)	(0.000)
Growth <sub>it</sub>	-0.039	-0.042	0.028	0.023	-0.153	-0.141	-0.040	-0.048
	(0.535)	(0.484)	(0.722)	(0.763)	(0.181)	(0.189)	(0.524)	(0.618)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255	6254	3639	3638	2616	2616	6255	6254
Pseudo R <sup>2</sup>	0.109	0.097	0.099	0.090	0.102	0.097	0.095	0.090

注:括号中的为 p 值,\*\*\*表示 0.01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0.05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0.1 的显著性水平。

第(7)列和第(8)列给出了模型(2)的检验结果,IC<sub>1</sub> × State 和 IC<sub>2</sub> × State 的系数分别为 -0.025 和 -0.426,并且分别通过了 0.01 和 0.1 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在非国有样本下,内部控制在抑制公司违规上发挥的作用更强。由此,假设 2 得到了验证,即内部控制在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均有抑制公司违规的作用,但是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发挥的作用更强。

从控制变量来看公司规模(Size)、股权集中度(NOI)、资产收益率(ROA)与公司违规显著负相关,资产负债率(Lever)与公司违规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规模越小,股权集中度过低、盈利能力差、经营风险高的上市公司更可能出现违规行为。

(二) 治理环境、产权性质、内部控制与上市公司违规

表 4 给出了假设 3 的检验结果,根据地区相对市场化指数(Market)的中间值 8.995 将总体样本分成治理环境差的组(Market ≤ 8.995)和治理环境好的组(Market > 8.995),分别对模型(2)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治理环境较差地区(Market ≤ 8.995)IC<sub>1</sub> × State 和 IC<sub>2</sub> × State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33 和 -0.301 并且均通过了 0.05 的显著性测试;而治理环境较好的地区(Market > 8.995)IC<sub>1</sub> × State 和 IC<sub>2</sub> × State 的回归系数为 -0.019 和 -0.545,但是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测试,说明内部控制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发挥的作用更强这一假设在治理环境较好的地区并不成立,也就是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提高,政府干预减弱,可以弱化内部控制在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作用差异。

表 4 假设 3 的检验

变量	治理环境差 (Market ≤ 8.995)		治理环境好 (Market > 8.995)	
	(1)	(2)	(3)	(4)
截距	3.968***	3.860***	1.213	1.224
	(0.000)	(0.000)	(0.285)	(0.275)
IC <sub>1</sub>	-0.021***		-0.017*	
	(0.009)		(0.080)	
IC <sub>1</sub> × State	-0.033**		-0.019	
	(0.011)		(0.152)	
IC <sub>2</sub>		-0.301**		-0.313
		(0.012)		(0.187)
IC <sub>2</sub> × State		-0.342**		-0.545
		(0.032)		(0.187)
State	0.563***	0.147	0.235	-0.016
	(0.005)	(0.184)	(0.308)	(0.906)
SIZE <sub>it</sub>	-0.256***	-0.263***	-0.142***	-0.151***
	(0.000)	(0.000)	(0.006)	(0.003)

续表 4

NO1 <sub>it</sub>	-0.795 **	-0.808 **	-0.644 *	-0.652 *
	(0.017)	(0.013)	(0.100)	(0.094)
ROA <sub>it</sub>	-0.277 **	-0.328 **	-0.473 **	-0.447 **
	(0.035)	(0.011)	(0.020)	(0.029)
Lever <sub>it</sub>	0.107	0.152 **	0.561 ***	0.544 ***
	(0.249)	(0.091)	(0.000)	(0.000)
Growth <sub>it</sub>	-0.076	-0.060	-0.008	-0.016
	(0.373)	(0.463)	(0.935)	(0.861)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141	3141	3114	3113
Pseudo R <sup>2</sup>	0.1560	0.1199	0.1700	0.1587

注:括号中的为 p 值,\*\*\*表示 0.01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0.05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0.1 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还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其结果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1) 内部控制质量(IC)与上市公司违规(Fraud)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引入工具变量 IC\_lag(内控治理的滞后变量)进行回归。

(2) 参照夏立军、方秩强(2005)的研究,用市场干预指数代替各地区市场化指数。

(3) 考虑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战略选择的影响体现为“壕沟防御效应”和“利益协同效应”(Jensen and Meckling,1976),即公司违规行为可能会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呈现先升后降的“∩”型曲线,因此在模型中加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NO1)的平方项。

(4) 考虑到盈余质量、审计意见、是否存在财务困境均会对公司违规行为产生影响,加入盈余质量、上期审计意见、财务困境指标 Z 指数作为控制变量。

五、结论

本文以 2007 - 2010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考察了产权、治理环境与内部控制治理效应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可以起到抑制公司违规的作用,这说明我国自 2006 年上交所出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2007 年深交所出台《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2008 年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10 年财政部发布了 18 个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等相关制度的实施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产权背景以及国有上市公司的特殊地位,使得内部控制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发挥的作用减弱,主要原因是由于各级政府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出现违规行为时,政府可能会出于企业声誉、社会地位、个人政绩等方面的考虑,对国有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采取“漠然视之”的中庸态度,致使内部控制比较差的上市公司难以发现内控问题,内部控制在国有上市公司的作用减弱。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提高,政府干预减少,以至于弱化了内部控制在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作用差异。

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是:第一,继续加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这对于企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第二,解决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不仅需要继续推进上市公司的产权改革,而且要从根本上减少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过度干预,加快市场化进程,改善治理环境。

参考文献:

[1] Ashbaugh - Skaife H, Collins, D., Kinney, W., LaFond,R., 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and their remediation on accrual quality [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8(1): 217 - 250.

[2] Doyle, J., Ge,W. and McVay, S., Accruals quality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7,5:1141 - 1170.

[3] Hammersley Jacqueline S., Linda A. Myers, Catherine Shakespeare, Market reactions to the disclosure of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an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weaknesses under section 302 of the Sarbanes Oxley Act of 2002[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y,2008,13:141 – 165.

[4] Benish, M. D. , Billings, M. B. , Hodder, L. D. ,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and information uncertainty[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8,83:665 – 703.

[5] Ashbaugh – Skaife H, Collins, D. , Kinney, W. , The discovery and reporting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prior to SOX – mandated audit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7(44) : 166 – 192.

[6] Ashbaugh – Skaife H, Collins, D. , Kinney, W. , LaFond, R. , 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on firm risk and cost of equ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9(47) :1 – 43.

[7] Litvak, K. , The effect of the Sarbanes – Oxley Act on non – U. S. companies cross – Listed in the US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7,13:195 – 228.

[8] Kim , J. , Song, B. , Zhang, L. ,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 and Bank Loan Contracting: Evidence From SOX Section 404 Disclosure[D].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orking Paper,2009.

[9] Bologna G J, Lindquist R J, Wells J T. The accountant’ s handbook of fraud and commercial crime[M]. New York: Wiley,1993: 20 – 31.

[10] McMullen D A, Raghunandan K, Rama D V. Internal control report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problems[J]. Accounting Horizons,1996,10: 67 – 75.

[11] 张川, 沈红波, 高新梓. 内部控制有效性、审计师评价与企业绩效[J]. 审计研究,2009,(06).

[12] 杨德明, 林斌, 王彦超. 内部控制、审计质量与大股东资金占用[J]. 审计研究,2009,(05).

[13] 孙芳城, 梅波, 杨兴龙. 内部控制、会计信息质量与反倾销应对[J]. 会计研究,2011,(09).

[14] 李万福, 林斌, 宋璐. 内部控制在公司投资中的角色:效率促进还是抑制? [J]. 管理世界,2011,(02).

[15] 杨德明, 冯晓. 银行贷款、债务期限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08).

[16] 方红星, 金玉娜. 高质量内部控制能抑制盈余管理吗? ——基于资源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2011,(08).

[17] 卢锐, 刘建华, 许宁. 内部控制、产权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J]. 会计研究,2011,(10).

[18] 林毅夫, 林志赞.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J]. 经济研究,2004,(02).

[19] 张翼, 马光. 法律、公司治理与公司丑闻[J]. 管理

世界,2005,(10).

[20] 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09 年报告 (NERI INDEX of Marketization of China’ s Provinces 2009 Report) [M].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21] 夏立军, 方秩强. 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2005,(05).

[22] 林斌, 饶静. 上市公司为什么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J]. 会计研究,2009,(02).

[23] 张龙平, 王军只, 张军. 内部控制鉴证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沪市 A 股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2010,(02).

[24] 单华军. 内部控制、公司违规与监管绩效改进——来自 2007 – 2008 年深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2010,(11).

[25] Jensen, M. , Meckling, W. ,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03:305 – 360.

(责任编辑:刘 军)

